

伏尔泰与中国

沈大力

我的好友勒内·艾田蒲生时总对我说他是孔丘的弟子，渴望得“道”。照我看来，法国18世纪另有一位儒家门生，他就是伏尔泰。19世纪时，维克多·雨果在其长篇社会小说《悲惨世界》里描绘一个巴黎顽童加弗罗什在参加1830年革命的一场街垒战不幸中弹倒地，临咽气前唱道：“我倒在地下，只缘伏尔泰启发。”难道流浪儿加弗罗什之死要归咎于伏尔泰的思想吗？很难断言。因为，他接着还低吟：“我跌进溪水，本是卢梭之罪！”总之，伏尔泰和卢梭两人都参与了狄德罗的《百科全书》，开启“启蒙纪元”，为法国大革命耕耘了土壤。

上世纪90年代初，中法两国外交关系处于冷冻时期，各层次的交流几乎完全终止，面对这一艰难局面，我出面主持“中法比较文化研究会”的活动，克服阻障，在中国大城市天津召开“伏尔泰国际讨论会”，时任法国驻华大使马洛、巴黎大学教授和吉·索赫曼等记者出席。借这次论坛之机，我们组织了伏尔泰《中国孤儿》的演出，由三个不同剧团在三个舞台上相继展开。

讨论会起始日上午，我们选择始建于清朝的天津“老戏楼”，其中有两座舞台。首先，天津人民艺术剧院在右翼一座舞台上开演话剧版

《中国孤儿》，到全剧第三幕结束，观众一齐将目光转向左翼另一座舞台，由天津河北梆子剧团接着往下演绎完整整个故事。这种奇特的戏剧对比演出方式让“老戏楼”里充满艺术的生气。讨论会当日晚上，天津京剧院为会议参加者演出了一场《赵氏孤儿》，以第三种形式呈示了不同文明的对比。

伏尔泰的《中国孤儿》于1755年在巴黎法兰西大剧院首演。作者系根据中国元朝（1280~1368）戏剧家纪君祥唯一流传后世的中国十大悲剧之一《赵氏孤儿》改编的。关于伏尔泰为何选择一个东方遥远中国的故事，他自己在给黎胥留公爵的一封信里坦言：“日前读到马若瑟神父翻译的中国悲剧《赵氏孤儿》，心生依之写一部悲剧的念头。马神父的翻译刊载在杜赫德神父为公众编的杂志上。中文原剧创作于14世纪的成吉思汗朝代，旨在表明胜利的鞑靼征服者无法改变被征服民族的风习，转而依中国的一切法律行事，保护这个国家的所有艺术。《赵氏孤儿》这部剧作超越了我们现今的全部努力。”

《赵氏孤儿》的传说原见于司马迁撰写的《史记》，是著名汉学家爱德华·沙畹将这部历史巨著翻译成法文的。京剧《赵氏孤儿》的情节正是取材于《史记》。故事发生在公元前7世纪古老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晋国大司寇屠岸贾杀害重臣赵盾，并灭门九族，只剩赵氏孤儿赵武幸免于难。屠岸贾欲将赵盾一家斩尽杀绝，在全国范围搜寻赵武。赵家食客程婴将自己的亲生儿子献出为赵氏孤儿替死。屠岸贾以为赵家一族全被灭绝，于是停止了搜捕。赵武遂躲过一劫，尔后在程婴的机巧安排下变成屠岸贾收养的义子。一日，程婴向赵氏孤儿透露了他一家人被屠岸贾残忍杀害的真相，赵武怒不可遏，起而杀死奸贼养父为死难的亲人们报仇雪恨。

这段故事里，最令人感动的是食客程婴的义举。为了救出赵氏孤儿，他宁肯牺牲了自己的孩子。可是，众人都认为他背主投靠暴君可耻，让他在漫长的岁月里遭受唾弃，忍辱偷生。这个人物正是儒家道

德的化身。伏尔泰从中看到他可以向自己同胞传播的价值观，因而断言：“《赵氏孤儿》是一座丰碑，比关于中华大帝国的任何记载都更能让人理会‘中国精神’。”巴尔扎克曾说：“抵达中国者永生。”伏尔泰恰恰要乞灵于中国，借以批判法国的专制主义。

谈到儒学西渐至法国，应该提到圣西门公爵的《回忆录》，其中考究了孔子的礼仪，还有菲利普·顾博理的《论孔子》一书，封面有孔圣的肖像。然而，将孔子思想在欧洲散播，主要功绩得归于耶稣会士，他们之中的杜赫德神父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杜赫德神父办的《中国通志》刊载大量有关“中华帝国”的讯息，源源不绝地引进新思想。伏尔泰正是在杜赫德神父的《中国通志》上读到马若瑟神父在华40载，着手翻译的《赵氏孤儿》。马若瑟的译稿原本应寄给巴黎王家图书馆馆长富尔蒙，却错落进杜赫德神父手里。杜神父于1735年将之刊载在《中国通志》杂志上，题名：《中国悲剧：赵氏孤儿》。1755年，马氏译作出版单行本，接着转译成英文、德文、荷兰文、意大利文和俄文。据说，哥德读了《赵氏孤儿》，也像伏尔泰一样，想据之写一部剧本。

伏尔泰一生都信仰一种臻于完善的文明，因而趋近中国意识形态而对儒家情有独钟。在《查狄格》第12章里，他描写一个来自“康巴鲁”，即北京，特别强调“理与天”的中国人，亦称“契丹人”，说他是一次众精英聚会中“最具理性的时贤”。在《中国孤儿》里，他更进一步发扬了“中国精神”。

伏尔泰确实对中国一腔热忱，相信元曲《赵氏孤儿》从整体上代表了中国文化，对法国颇有新意。他颂扬中国人，透析中国风俗。他之所以对《赵氏孤儿》感兴趣，是因为这部元曲让他感悟到形而上学的危殆，进而批判当时法国文明的一种虚浮现象。他恰是以中国的意象来表达自己哲学意念的。丹麦文论家乔治·勃兰兑斯指出：“中国是一个不信神的、民风淳朴的古老国家。伏尔泰关注这种和平的文明，颂赞纯人文的美德、忠诚、牺牲精神和对人类理想经久不衰的眷恋。

归根结蒂，《中国孤儿》申明一种生活哲理，与讽喻小说《老实人》成悖论。”

伏尔泰将《赵氏孤儿》引进法国人文主义科学领域，凸显孔子及其伦理的超卓，企望法国人葆有爱之美德，弃绝罪恶。在伏氏笔下，成吉思汗体现出暴君与明主的双重身份，他在剧终时对剧中主人公、自己所恋美人伊达梅尔的丈夫张惕说：“我曾是一个征服者，您使我变成了一个贤明君主。”这一剧情表明，伏尔泰这位法国哲学家出于诸说混合精神，接受了儒家关于“仁义”的思想。

显然，伏尔泰在《中国孤儿》里并没有照搬中国戏剧家纪君祥原作的悲剧情节。纪君祥的《赵氏孤儿》发生在公元前7世纪，而伏尔泰则将《中国孤儿》的故事移到13世纪蒙古人攻占北京的时代。期间相隔两千年。成吉思汗意对被征服者实施种族灭绝。这时，官吏张惕和其妻伊达梅尔挺身而出，让自己的孩子替“中国孤儿”挨刀，正像《赵氏孤儿》中儒生程婴所做的那样。张惕夫妇的救孤计策暴露，二人被判死刑。关键时刻，成吉思汗认出了他昔日无望追求过的伊达梅尔，逼迫美人委身于他，否则将跟丈夫张惕一同受戮。伊达梅尔誓死不屈，决意自裁，抗拒到底。成吉思汗被一对汉族儒家夫妻的心灵高洁所感染，最终赦免了他们俩。

伏尔泰的悲剧是以儒家伦理战胜结束的。他自由改编一部中国经典名剧，表达自己的观念，这种做法让人联想到清朝末年诗僧苏曼殊。曼殊法师曾经参加过孙中山先生领导的1911年革命。作为维克多·雨果《悲惨世界》的最早汉译者，他仅仅翻译出原小说前6章，其余部分均为他自己的“创作”。在他翻译的《悲惨世界》里，珂赛特被改名为“孔美丽”，是孔子的后代。这里，有意思的是一个中国和尚欲借“法国孤女”之力来推翻中国历经几千年的封建专制统治。

作为启蒙纪元的先哲，伏尔泰还有另一侧面值得人们关注，那就是他还受到中国道家思想的熏陶。1982年，我在巴黎附近索城公园的“玫瑰泉”镇逗留三个月，听人说伏尔泰一度失意时曾栖身索城。我

寻觅他的足迹，毫无所获，但读了他于1747年在索城写就的哲理小说《查狄格，或曰命运》。这一小说现今非常有名，但绝少有人知道其中第二章是作者从一篇中国小说里几乎原封不动地“抄袭”来的。这篇中国小说名为《庄子休鼓盆成大道》，系由耶稣会在华传教士殷弘绪1723年译成法文，也即杜赫德神父发表在《中国通志》上的那篇。原小说辑录在明朝抱瓮老人编的《今古奇观》里，旧版现存巴黎国立图书馆。中国读者可在冯梦龙的《警世通言》第二卷中找到这篇梦幻故事。欲知庄子的奇闻异事，可读由艾田蒲编辑、伽利玛尔出版社发行的《中国道士》一书，领略一番庄氏的“蝴蝶梦”。

庄子乃是公元前4世纪一位道教思想家。他曾写道：“我怎么能得知人生之爱不是一种幻象呢？一次，我梦见自己变成一只蝴蝶，飞来飞去，在花丛中采蜜，对自己这种命运颇感欣慰，忘却原先的人身。蓦然，我惊醒过来，发现自己本是一个人。现今，我不知道自己是一个人梦见变成蝴蝶，还是一只蝴蝶梦见自己变成了人。”这就是中国人所谓的“蝴蝶效应”，亦称“蝴蝶梦”。做梦的庄子演绎了他的突变哲理。照他看来，人生如云雾般顷刻幻变。这个道士的日常表现却也正反映出他的人生观。一日，他游方到一座山脚下，遇见一个新寡之妇在她先夫的坟上频摇扇子煽风，惊问其故，对方答曰：“先夫在世时曾经叮嘱，须待他死后坟头的土干了，我方能改嫁。可是这坟上的土还迟迟不干，我不得不用扇子来煽……”不言而喻，寡妇此举深触庄子心底。回到家里，他想试探一下一直鸣誓对丈夫忠贞不渝的妻子，于是装死。妻子将庄子入棺服丧，没多久就恋上一个小白脸，急着嫁给他。洞房花烛之夜，新夫突然心疼难忍，必得一新近死者的脑髓以热酒吞之，方能治愈。妇人立刻寻来砍柴板斧劈棺，要取前夫脑髓。庄子恰于此时复活，见妻子手持斧子向他天灵盖劈来……

这就是《庄子休鼓盆成大道》里讲述的故事。小说的题目本身就简明扼要地概述整个情节及庄子悟道的结局。伏尔泰读了深为心动，

遂将庄子行路上的遭遇移植到他自己的哲理小说《查狄格，或曰命运》里，用“蝴蝶梦”喻世，让追逐虚荣的人警醒，正像他在《中国孤儿》中所言明的那般殷切。他声称《查狄格，或曰命运》是一篇“东方故事”，叙述巴比伦王子查狄格的漫游经历。查狄格遭未婚妻塞米尔弃置，转而娶了“靓女”阿佐拉。阿氏是个不贞之妇，难以相处。一天，她外出散步回家，对夫婿查狄格说：

“我去安慰年轻寡妇珂丝鲁，她新近刚将死去的夫婿埋在一条小溪旁。她起誓，只要坟边的溪水常流，自己就在那里守孝。可是，丈夫死了两日，她就急于给溪水改道。”

阿佐拉言辞激烈地指责年轻寡妇不贞。查狄格是个机灵的人，他要检验妻子的忠贞表态，于是就像中国道人庄子那样假死。得悉夫婿死了，阿佐拉显得悲痛欲绝，要在查狄格的坟前自尽。其时，查狄格的好友卡朵儿赶来安慰阿佐拉。不料，阿氏一下就爱上了卡朵儿，二人成了情侣。一夕，两人共进晚餐时，卡朵儿骤然脾脏剧痛难忍，需用一个刚死者的鼻子急救。也真是个奇异的疗法！阿佐拉毫不犹豫地拿上一把剃刀，赶到查狄格坟上。她先泪洒坟茔，劈棺见查狄格静躺其中，紧接着就动刀去割丈夫的鼻子。查狄格忽地挺身而出，一手护鼻，一手拦住妻子手里的剃刀，发话道：“妇人，您可别再凌迟年轻的珂丝鲁寡妇了。来割我的鼻子，这跟她让溪水改道不是异曲同工吗？”

终了，查狄格休了妻子阿佐拉，一心一意研究起大自然的规律来。他像中国哲人庄子一样，顿悟人世的荒诞，揭露道德的沦丧。这里，笔者无意指控法国大作家伏尔泰有抄袭之虞，况且18世纪时欧洲还没有保护版权的《伯尔尼国际公约》。今朝，作家迈克尔·乌埃尔贝克在写小说《地图与疆域》时抄袭维基百科，证据确凿，但并没妨碍他在2010年荣获龚古尔文学奖。处于相同情况，德国的国防部长却不得不引咎辞职。乌埃尔贝克公开扬言说，数家报纸指责他“抄袭”是“语言粗鲁”，他的所为本是许久以来就采用的“文字手法”。但愿此法不是始于伏尔泰！

在《中国孤儿》之后，伏尔泰又借助另外一个中国古典作品来阐明他的莱布尼茨式哲学观，这是个不争的事实。1990年，阿舍特书局再版《查狄格，或曰命运》，由克洛德·布鲁姆详加注释。关于该书第二章《鼻子》，布鲁姆指出：“在《鼻子》一章里，伏尔泰借鉴了他从杜赫德《中国通志》第三卷里读到的一篇中国小说……在他取材的原中国小说里，作者写的是‘脑髓’，即道士庄子的‘脑髓’，而非‘鼻子’。”

以上谈的是一个比较文学课题，论及中国与欧洲在文化上的相互影响，让人了解“他者”这个对方。在全球“文明种突”的今天，跨文化对话十分重要，伏尔泰对庄子的“蝴蝶梦”产生浓厚兴趣的事实表明，中国的道家学说在18世纪曾经影响了一些欧洲的哲学家。法国人是通过东方学家斯坦尼斯拉斯·朱利安所译《道德经》了解道家宇宙观的。老子的《道德经》全书仅有5千字，是一部道家经典，宣扬出世得道的学说。根据这一学说，宇宙始终处于不停的起伏运动之中，并无什么造物主。现今，这种“持续创造运动”思想意识形态正促使人们重新审视基督教色彩浓厚的、有关宇宙起源的所谓“大爆炸”理论。

老子揭示：道者反之动。他在《道德经》第30章里进一步明确：“物壮则老，是谓不道，不道早已。”这一个观念并不难懂。比如，一个人攀登至山顶后，还能干什么呢？他不得不下山了。人生亦如此。作家保罗·布尔热的话很有道理。他说：“所有动物纵欲之后，感受的都是阴沉。”恰如法语里所说：“杯满则溢。”在中国，像在法国一样，公民要发财致富，就得“多干多赚”。然而，这似乎并不符合“道”理。“道”也并非神圣，巴尔扎克说：“在尘世，一切都具有两面性，是相互矛盾的。”他写出《人间戏剧》是否得“道”了呢？伏尔泰又怎样？尚待另行研究。本文表露的只是：在其哲学求证中，伏尔泰受到了儒家社会道德和老子生活观的影响，仅此而已。